

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党建+”实现路径研究 ——以江西省南昌市社区为例

刘小钧, 张艳国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南昌市社区“党建+”模式生动地、集中地表达了社区党建的内在要求,即社区党建不是与社区其他工作相并列的一项独立工作,而是作为机理、机制、内驱力等要素内化于社区建设与治理一切领域,体现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个方面,融入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全过程,构成社区良性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但是也要看到,当前社区党建在人才队伍建设、服务能力、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参与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为此,一是构建党委领导下的社区“党建+”工作体系;二是明晰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权责边界,积极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工作;三是鼓励引导社区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导作用;四是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库,发挥现代社科知识和治理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智囊作用;五是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其正向作用。

关键词: 城市社区; 社区建设与治理; 党建+; 南昌市

中图分类号: D26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1-0046-08

Study on the Path of Realizing the Building of Urban Commun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aking the Communities of Nanchang City in Jiangxi Province as Study Cases

LIU Xiaojun, ZHANG Yanguo

(President's Offi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Communities in Nanchang City vividly and intensively reflect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Party building of communities, namely,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mmunity is not an independent work in parallel with other work in the community, but all fields internalized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as mechanism,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other factors, embodies in all aspects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integrates into the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es the inner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But we also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overcome and solved in such aspects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mmunities of Nanchang City, Jiangxi Province as

收稿日期: 2017-03-20

基金项目: 南昌市 2016 年度重大招标课题“深入推进社区‘党建+’工作,不断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研究”(编号: Zdsk201602); 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城市社区善治中协商民主研究——以南昌市社区治理为个案”(编号: 15ZZ01)

作者简介: 刘小钧(1979-),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张艳国(1964-),男,湖北仙桃人,江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转型、城乡基层治理。

talent team building ,service ability ,community autonomy abil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tc. Accordingly ,firstly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Party building + ” work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secondly ,we should clear the boundaries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work of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e community and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ty; thirdly ,we should encourage and guide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emplary guiding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fourthly ,we should establish a sound expert advice librar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rain truster function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fifthly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capital and market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lay its positive rol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ie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 ; Nanchang City

社区党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探索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件。一方面,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来看,社区党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石,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1] (p106)} 另一方面,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1] (p106)} 从中央政策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方面从基层民主政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强调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另一方面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区服务在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2] (p57)}

一、对比与反思:南昌社区党建在全国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新探索

创新社区党建,加强社区服务,提升社区现代治理能力,是中央大力倡导、国家民政部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也是各地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3]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考察期间,在视察南昌市光明社区时,着重考察了解了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指出社区党组织要回应居民需求,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建设和谐社区、和美社区。^[4] 国家民政部于2008年和2013年先后两次开展了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分别制定出台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指导标准》,并命名表彰一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从2011年以来,国家民政部先后批复确认了三批共83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探索新形势下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亮点纷呈,成果显著。

江苏省在总结太仓“政社互动”经验基础上,于2013年在全省推行“政社互动”治理模式,提出力争在2017年全省实现“政社互动”全覆盖。浙江省杭州市将其社区治理经验提炼概括为“社区大党建”模式。福建省厦门市将社区治理总结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厦门模式,得到国家民政部的肯定和支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黄门街社区创新探索了以“党建区域化、网格立体化、服务社会化”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三化”模式,有效地提升了治理能力。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从社区管理信息化着手,借助数字地理信息系统的手段和平台,建立“碑林智慧社区”系统,提升了治理能效。自2004年以来,上海市把社区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形成了以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为依托、“一门式”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为基础、社区信息化标准体系为支撑的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

台建设模式,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办事,提高了政务服务的群众满意度。^[5]这些模式在全国范围都取得了广泛影响,不仅对提高社区治理效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和谐社区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而且为其他城市推进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借鉴,这种品牌效应还大大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构成城市竞争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重点的改革活动,这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一是反思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这种考核模式主导下,政府行为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民生建设和环境资源,由此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政绩观,改革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1](p161)}二是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是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峻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昌市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最新势态,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同“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p224)}相结合,于2015年出台《〈关于全面推行“党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以社区“党建+”引领南昌社区新突破、新发展的建设思路和治理模式,指出“党建+”是将党的建设融入党的各项事业、各项工作中,通过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新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社区“党建+”的核心在于,通过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社区党组织现代服务能力和现代治理能力,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互融合,使基层党组织适应和驾驭日趋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形势,彻底改变当前社区党组织弱化、甚至边缘化的不利局面。

同其他城市社区经验相比,南昌市提出的社区“党建+”治理模式,具有形象、直观、新颖、准确、前瞻的特点,生动地、集中地表达了社区党建的内在要求,即社区党建不是与社区其他工作相并列的一项独立工作,而是作为机理、机制、内驱力等要素内化于社区建设与治理一切领域,表现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各个方面,融入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全过程,构成社区良性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继续深化对社区“党建+”理论探讨,探索落实“党建+”实现路径,以“党建+”引领文明和谐社区建设,形成社区“党建+”的南昌模式,必然对江西省乃至全国社区治理创新都产生积极影响。

二、经验与问题:南昌市社区党建工作现状

从整体上来看,南昌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以发展社区服务业为核心的社区党建阶段、以建设和谐社区为目标的社区党建时期和以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社区党建深化时期。这三个时期经历了突出重点到整体发展,再到全面深化的过程,体现了南昌市社区党建不断深入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经过这些发展阶段,南昌市社区党建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在整合社区社会资源、调节居民矛盾、开展社区文体活动、推进社区协商民主等方面,许多社区党组织都起到了领导、组织、协调、督促的重要作用,社区党建是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但不能忽视的是,南昌市社区建设还没有将社会资源、治理主体、制度规范等有效地整合起来,在“党的领导—社会参与”“正式制度—日常习惯”“政府—社会—居民”“社区参与—回应反馈”等关系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与整合。这些问题和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共性,集中体现了处于快速变化社会中的社区治理转型难题。

(一) 南昌社区党建基本经验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南昌市以社区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建+”,从而在探索社区建设规律、打造社区公共服务品牌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南昌经验”。

1. 社区党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基本规律。社区既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具有私人需求和日常生活的属性;也是一种非日常的管理活动,具有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属性,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一方面,南昌市注重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推进社区建设,将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为提升居民日常生活幸福指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党建要同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提升城市生活幸福指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社区党建要服务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南昌市探索形成了“民情理事会—民情家访制—基层民主协商”发展路径,使协商民主与日常生活深刻关联,让民主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社区民情理事会是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性议事组织,是社情民意、矛盾纠纷、利益诉求等表达和反映的常设机构,是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组织载体和活动平台。而“民情家访”制度是在社区民情理事会的基础上,增加了党政机关同社会各个方面协商合作的环节,使社区民主协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开展,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权威性和建设性。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使社区协商民主既有群众基础,又可避免社区协商民主陷入“民粹主义”的误区,发挥民主的正向效应。^[6]

2. 努力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增加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是南昌市社区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区针对社区自身的特点,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做法,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从而形成了一些富有特点的服务品牌,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支持和肯定。比如,绿源社区和兴柴北苑社区针对老年人特色服务、里洲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和铁路四村的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等。总的来看,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南昌市社区服务趋向系统化、网络化、人性化发展,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社区服务实体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完善和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即包括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和优抚对象;面向普通居民的便民利民的日常服务;面向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

3. 不断增强社区居民自治能力。通过社区党组织来引导、组织、协调社区居民自治活动,提高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这是南昌市社区治理中一项重点工作。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南昌市社区的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合作能力。2015年2月,东湖区的上营坊社区56单元、58单元、60单元的地下化粪池管道破裂,导致地下管道的脏水四溢,给居住在这些楼栋的居民带来很大不便。在请专业工程人员对下水管道进行检查后发现,只有对化粪池及附属管道进行彻底维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涉及此次事件的70户居民集体协商,共同行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社区党支部的组织协调下,经过社区居民中积极分子的联系沟通,70户居民推选出了由1个群众领袖、5个群众代表和2个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的维修委员会。他们制定了维修方案,居委会帮助他们请市政工程部门做了工程预算,然后维修委员会组织居民开会,商讨维修方案并筹集维修资金,达成一致意见后,聘请施工单位进行维修,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整个过程中,维修委员会的工作都处于公开透明状态,工程进度和费用都用度都向居民公布,大家都满意,既解决了社区存在的问题,又锻炼了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公共合作能力,居民间的友谊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增强。

4. 始终坚持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公共权力行使者向公共权力的所有者负责,这是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原则。^[7]南昌市对畅通党政机关与社区居民之间反映回馈机制,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一是根据社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对社区建设内容进行分类,然后以此为依据,厘清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将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归并,实现社区建设实际需要同政府职能的对接,避免政出多门现象。二是推进社区减负工作。社区减负是规范政府权力行使,明确社区自治权限的前提和基础。从2015年起,南昌市开始在西湖区推进“社区减负”试点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厘清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

的界限,清理社区所有要承担的工作事项,然后对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的社区工作任务予以取消。三是构筑党政领导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直接对话交流平台和制度机制,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制度。在社区层面,南昌市构筑了“民情家访”为平台和载体的党政机关与社区居民直接沟通交流形式。从2012年开始,在全市推广社区民情理事会制度,以民情理事会为平台,安排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到各个社区“定时、定点”开展民情家访工作。同时,还不断完善问责追究制度,形成了通报批评、责任约谈、重点问责等问责追责机制。

(二) 南昌社区“党建+”存在问题

当然,在城市社区“党建+”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情况,涌现新问题,需要更大的探索勇气予以破解。

1. 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存在着流动性较大、队伍不稳定、性别比例失衡、老龄化和人才流失等问题。当前,社区干部绝大部分是女性,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地、经常地纠结于去留问题,不能安心工作,往往说走就走。从我们抽样调查的12个社区来看,平均每个社区有工作人员8名,能坚持在一个社区工作两届的不到25%。从最近两次社区换届的情况来看,往往是每一次社区换届选举,社区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都要更新。社区还面临着人才匮乏且老龄化情况严重等问题。在徐家坊街道办事处,街道机关党务工作者只有1名,并且身兼数职,对党务工作投入精力不足,应付了事。社区(村)“两委”换届前,全街道有4个社区空缺专职副书记,而且学历层次偏低,大专以上仅占31%,45岁以上的占56%。^[8]在青云谱镇,各村党总支成员中35岁以下的只有1人,50岁以上的有9人(占45%),老龄化现象严重,制约了工作思路创新,影响了工作落实和推进;各村(社区)党总支成员中高中以下学历占68%,不会运用电脑占70%,科技型、知识型、经营型人才匮乏。^[9]

2. 部分社区党组织面临管理方式单一、从严力度不够、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是社区党组织教育活动内容空洞,党员教育主要还是采取“三会一课”形式,支部组织生活还停留在学学文件、读读报纸,以会代教,仅满足于单方面的灌输。社区党组织活动形式单一,党员教育内容和方法单一化与党员需求多元化的矛盾突出,弱化了党员积极性,制约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9]二是党员教育和民主评议趋于形式,从严力度不够,经常性管理监督不力,有少数党员都不参加组织活动。有的支部组织生活只看人数、次数,而对组织生活质量、制度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与否则很少过问。^[8]三是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还存在能力不足、创新不够、方法不多等问题。此外,社区党组织的活动场所和活动经费也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3. 社区行政化困境,社区减负增效面临较大难度。南昌市委组织部和市民政局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社区承担的各类行政性事务共有387项,这类事务占到社区所有工作的近80%。2015年,南昌市开展社区减负的试点工作,将原有的387项社区工作整合归并为151项,但社区减负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核心问题是,如果源于省级或国家级的行政事务、评比考核不减少,那么仅仅从市级层面推动,从社区层面着手,社区减负增效的效果还是会受到制约。这种情况的存在,表明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务过多地占用了社区有限的资源,挤压了社区的自治空间,不利于社区自治功能的健康发展。就全国层面来说,社区负担过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各地关于社区减负的做法不一。当前较为可取的做法,也是国家政策鼓励探索推进的办法,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4. 社区参与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一是在社区参与群体上,一部分积极分子的热情参与同大多数居民被动消极参与形成明显对比,一部分人的热情参与、经常性参与同大多数人的选择性参与、不参与形成较大反差。参与活动较多的人群集中分布在社区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和生活困难群体,尤其以中老年妇女为主。比如莱茵半岛社区文艺团里的成员,其来源主要是退休的干部、老师和工人。而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主要是给在城市工作的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等。二是就社区参与的种类来说,社区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多,而在社区政治参与和社区公益参与上,社区居民参与

比例较低。三是从参与的频率看,社区活动的经常参与者和支持者总是相对固定的群体。建设桥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社区的文体活动主要是靠两个社区文艺团体,这两个社区文艺团体就可以支撑起一台晚会。”

三、前景与展望:以社区“党建+”引领南昌和谐社区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基石

瞄准城市社区“党建+”这个关节点,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可以说,只要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确保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循着“党建+”这条可靠路径,顺利推进和圆满实现和谐社区建设,乃至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1. 构建党委领导下的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协调机构,切实加强对南昌社区“党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协调和监督检查。一是要完善领导责任机制,明确县(市、区)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街道党工委书记)作为直接责任人、社区(村)党组织书记作为具体责任人的职责,充分发挥城乡社区党组织在推行社区“党建+”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理顺从上到下社区“党建+”的组织领导体系,确保社区“党建+”各项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有序推进。二是以“民情理事会—民情家访制—基层民主协商”为中轴,完善南昌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打造社区协商民主的南昌经验。坚持基层协商民主与社区选举民主并重,突破以选举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模式,注重民主与利益分配、日常生活、社区治理的深刻关联,健全利益诉求表达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民主成为社区运转的内在机理和核心要件。三是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组织部门、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协调和业务指导作用,以党建带社建,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不断强化社区建设的组织基础。

2. 明晰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权责边界,积极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工作。当前社区工作普遍存在行政事务多、检查考评多、会议台账多、不合理证明多等“四多”问题。2015年7月,民政部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的要求和南昌市社区实际情况,一是要全面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规定,编制《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目录,拟定社区事务清单,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明确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职责的边界与范围,区分法定职责工作事项和委托协助工作事项的处理办法,对党政部门的组织机构、工作任务、统计调查等必须延伸到社区的,严格实行准入报批制度,未经准入者不得进入社区。二是要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综合考评、考核、评比指标体系,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指标一并纳入,各职能部门不再单独组织考核评比活动。三是要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根据社区工作实际和群众需求,对各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和加挂的各种牌子进行规范清理,能整合机构的一律整合,能取消的牌子一律取消。社区办公场所对外只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牌子以及“中国社区”标识。四是要建立统一的电子台账。目前,各地社区每年要做的各类纸质工作台账数量和种类太多,最多的社区超过300本,这不仅浪费了社区工作者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还造成了社区台账弄虚作假现象。应当对各类社区纸质台账加以整合归并,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台账,合并名目不同而内容重复的台账,应由职能部门处理的台账要收归处理。五是要规范社区盖章。要根据文件要求,开展社区盖章项目的专项清理工作,使社区盖章规范化、简捷化。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且社区有能力提供证明的,方可使用社区印章;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证明核实事项不得要求社区

出具证明。^[10]

3. 鼓励引导社区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导作用。相较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区志愿者服务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和优势,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居民需求的相关信息,并及时提供相应服务,反映了社会自我救助、自我服务、自我修复的功能和机制。南昌市社区服务在队伍规模、社会资源、参与氛围、服务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不足,严重制约着社区生活质量和社区治理绩效。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积极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不断充实和扩大南昌市社区志愿者队伍。比如,借助吴天祥精神这个品牌效应,湖北省 10 多万党员干部自发成立 1 万多个“吴天祥小组”,常年活跃在农村、街道和社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起到了凝聚力量、传播正能量、解决矛盾的重要作用。南昌市也有许多热心公益的党员干部,他们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人数并不少。比如,从 2008 年至 2016 年,南昌市就有 50 位人士登上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和发布的“中国好人榜”,其中许多人都是普通党员干部。这些人是南昌市“好人”群体的代表,也是南昌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人才资源。南昌市委市政府应当做好组织、宣传、引导等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这些“南昌好人”在其活动领域里的标杆示范作用,同时动员社区党员干部,以他们为核心和纽带,将热心于社会志愿者活动的人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组织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不断充实和壮大社区“党建+”志愿服务力量,形成“滚雪球”效应,提高社区治理的综合效应。这需要政府部门承担更多的组织和引导工作,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集起来,握成一个有力的“拳头”,这样才能显示资源聚集整合的巨大效能。

4. 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库,发挥现代社科知识和治理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智囊作用。从国内外发展趋势看,建立专家智库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在国际上,有著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等知名智库,这些智库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优化政府决策、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国内,2006 年在北京召开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建设高水平智库、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是一项社会共识。随着专家系统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专门化、技术化和知识化的社会领域。专家学者以其丰富知识和前瞻性眼光,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出主意、想办法、解难题、理论提炼、经验总结的独特作用。广泛地引入专家学者参与社区治理,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既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思想指导和思路来源,又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实证案例和经验支撑。南昌市在推进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非常有必要组建一个由多学科专家学者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整合省内外智力资源,借助各类研究平台,实现党政部门、专家学者和社区之间的密切合作和良性互动,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形成若干具有江西特色、反映南昌经验、在全国层面都叫得响的品牌社区,并为南昌社区进一步发展打下牢固基础,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增强南昌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竞争软实力。

5. 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其正向作用。社区建设需要多种社会资源,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支撑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善治。在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条件下,必须发挥资本和市场在社区治理中资源配置和整合作用。但纯粹的市场化运作会因为利益最大化等原因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社区分化和隔离等问题。因此,发挥市场与社会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必须与基层党的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联系在一起,必须以扩大社区公共利益、提升居民福祉为最终目标和价值取向。具体而言:

一是国家要逐步引导、鼓励市场主体介入到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借贷优惠等等措施,将市场主体引导到社区建设上来,还要通过政治吸纳、荣誉授予、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等办法,逐步实现对市场主体的政治社会化。二是要鼓励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并予以各种必要的支持,使其活动逐步实现与社区公共需要相对接。还要加强社区志愿者组织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组织,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三是政府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益,为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空间和政策空间,防止资本支配社会,更要防止权力沦为资本的奴隶,使政府真正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使政府的活动始终保持社会公正性。四是要引入社区居民评价机制。要逐步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范围和途径,完善社区听证会、社区议事会和社区理事会等居民民主协商平台,凡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需要由居民通过合法程序来决定,保证居民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切实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五是完善政府监督管理职责。调查表明,许多物业服务公司在服务理念、手段、方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许多问题,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社区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效率。一些明显不具备物业服务能力的公司,因为更换程序繁琐、居民意见不统一、相关制度不明确等各种原因,不能及时替换,从而导致一些社区居民同物业公司矛盾冲突。这些充分表明,在社区治理中,要发挥商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正向作用,需要有健全的制度环境、有效的市场监管和广泛的居民参与。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 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3]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路[N]. 人民日报 2015-03-06.
- [4]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N]. 人民日报 2016-02-04. 亲切关怀 心暖如春——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看望慰问我省干部群众回访[N]. 江西日报 2016-02-04.
- [5] 本刊编辑部. 社区治理的地方创新[J]. 中国民政 2015 (3).
- [6] 张艳国, 刘小钧.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江西南昌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7 (1).
- [7] 张艳国, 刘小钧. 论权力来源与行使的互动关系[J]. 学习与实践 2013 (9).
- [8] 徐家坊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敏 2014 年度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报告[EB/OL]. <http://www.qypdj.gov.cn/Publish/dwgk/635591637081135000dd2ed1d3-4a0f-4ac2-a281-2b58747e053e.htm>. 青云谱区党建网.
- [9] 青云谱镇党委书记喻蓉 2014 年度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报告[EB/OL]. <http://www.qypdj.gov.cn/Publish/dwgk/6355916420745725006ac393f1-d8e2-4d4b-9519-6d40ba5f4adc.htm>. 青云谱区党建网.
- [10] 张艳国. 牢牢牵住“减负增效”这个社区治理的牛鼻子[J]. 中国民政 2015 (23).

(责任编辑: 余小江)